

# 传记写作的互文性解释策略\*

——以格林布拉特的《俗世威尔: 莎士比亚是如何成为莎士比亚的》为例

许勤超

(青岛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61)

**[摘要]** 莎士比亚作品充满魅力,而记述莎士比亚生平事实的资料非常有限。莎士比亚是如何成为莎士比亚的问题一直吸引着传记家和学者去探索。格林布拉特的《俗世威尔: 莎士比亚是如何成为莎士比亚的》以莎士比亚所处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环境为背景,通过作品与作品,作品与历史事件、传主个人事实和逸闻,作品与历史背景、人们的精神风貌和风俗习惯等的互文解释,记述和解释了莎士比亚的生平和性格。这一互文性的解释策略达到了解释的目的,是对传记文学写作方法的探索和补充。

**[关键词]** 莎士比亚;互文性解释;传记;人文情怀

**[中图分类号]** K81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7740(2010)04-0024-06

作为纪实性文类,传记始终存在着历史真实性和文学艺术性之间此消彼长的矛盾。一些传记作品特别强调真实性或历史性,使写出的传记缺乏审美的特质和想象的空间,而有些传记作品过度注重文学性,使传记作品的真实性大打折扣而成为小说等纯文学作品的附庸,真正的传记应该是历史性和文学性的统一。<sup>[1]6</sup> 传记家在叙述传主的生平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利用一切文学手段对传主的生平和性格进行生动的描述,这样才能使传主的性格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而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就必须采取对事实解释的方法。解释已成为现代传记的一个重要因素。<sup>[2]1</sup> 现代传记的确在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传记家不但叙述事实,更要解释事实。西方现代传记家斯特雷奇说:“未经解释的真实就像深深埋在地下的金子一样毫无用途,艺术是一位了不起的解释者。”<sup>[3]</sup> 在传记文学的解释里,传记家常根据历史事实和作传目的选取不同的解释策略以达到其解释的目的。司马迁写《史记》是为了以史为鉴,以至于他写的人物传记个性突出且充满悲剧意识。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写《俗世威尔: 莎士比亚是如何成为莎士比亚的》是要说明莎士比亚是如何成为莎士比亚的,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格林布拉特吸收现代传记理论,以其深厚的新历史主义学术功力,以互文性解释为策略,对莎士比亚生平和性格作了令人信服的解释,这种互文性解释的写作方法给

传记的写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莎士比亚的作品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莎士比亚也成为个谈不完的话题。正像他的同时代人本·琼生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不需要陵墓的纪念碑”<sup>[4]xix</sup>。像他这样一个没受过大学教育的普通年轻人从偏远的小城镇来到伦敦,在非常短的时间里,成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所取得的成就如何解释?许多人都试图从其生平中找出答案,可除了莎士比亚创作的剧本和诗歌外,有关莎士比亚生平的资料十分匮乏。在《俗世威尔: 莎士比亚是如何成为莎士比亚的》的序言里,格林布拉特指出:“如果要明白莎士比亚是谁,重要的是以他留给我们的言辞为根据,溯源于他曾经历的人生和他所处的生活世界。而要理解莎士比亚是如何运用其想象力将其生活转换成艺术,最重要的是要靠我们自己的想象力。”<sup>[5]14</sup> 格林布拉特正是遵循这一原则,运用作品、历史事件、传主个人事实和逸闻、文化习俗等因素之间的互文关系来解释莎士比亚何以成为莎士比亚的。

## 一、作品与作品的互文解释

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学者公认属于他原创的主要剧情寥寥无几。有学者称他是一个高级的偷猎者,这当然不是对莎士比亚的贬低,正说明他是一个虚心学习、善于从生活和历史中挖掘素材的人。当他初到伦敦时,还是一个名不经传的小人物,但他充

\* [收稿日期] 2010-11-02

[作者简介] 许勤超(1970-),男,河南开封人,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满理想。格林布拉特分析到,伦敦给他提供了实现理想的机遇,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些重要的作家,包括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托马斯·沃森(Thomas Wastson)等人。马洛的《帖木儿》给莎士比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许改变了他的一生。马洛的《帖木耳》是一部极具震撼力的剧作,该剧的主人公是个塞西亚牧人,凭着自己的决心、超凡的精力和绝对的无情征服了绝大部分已知的世界。该剧具有史诗规模,充满喧嚣、血腥场面和异国情调。剧中展示的是不断的暴力冲突,它只能靠掌握至高权力才能完全平息。而莎士比亚首获成功的《亨利六世》在对权力的渴望和剧情的氛围营造上与《帖木儿》十分相似,当然莎士比亚展现更多的是全国叛乱和内战给人们带来的恐慌。通过对比分析,格林布拉特推断莎士比亚是一个胸怀理想、善于学习的剧作家。他写道:“莎士比亚下决心要像马洛那样写一部英国史诗,它将记载都铎王朝带来秩序之前充满血腥的动荡年代。”<sup>[5] 195</sup> 莎士比亚的确是这样做,他从霍林谢德(Holinshed)的《编年史》中精心挑选能模仿《帖木耳》的素材,创作了《亨利六世》第一至第三部,还从托马斯·诺斯(Thomas North)翻译的普鲁塔克(Plutarch)的《名人传》中吸取素材,创作了不朽的《裘力斯·凯撒》、《雅典的泰门》、《科利奥兰纳斯》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莎士比亚对马洛是欣赏的,但二人又是竞争对手。格林布拉特认为,马洛和莎士比亚不仅存在个人竞争,他们还对戏剧本质持不同的看法,也就是对人的价值有着不同的理解。莎士比亚认识到了马洛的才华,但马洛的语言和想象中的某些东西似乎也令莎士比亚甚为反感。对于他们之间的分歧,莎士比亚没有留下任何专门论述。格林布拉特通过对马洛《马耳他岛的犹太人》中的巴拉巴斯和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里的夏洛克的相关描述进行比较,认为二人对犹太人的不同态度可以印证这一点。马洛的《马耳他岛的犹太人》是一部黑色喜剧,很出色但极为冷酷、愤世嫉俗。马洛用反面人物犹太人巴拉巴斯和他的穆斯林奴仆伊萨莫尔揭露了马尔岛基督徒世界的腐败。在他的揭露中,也汇聚了对犹太人的最恶意传说。巴拉巴斯对基督徒的痛恨胜过他对金钱的热爱。他想尽一切办法杀害基督徒,这是他人生的最大乐趣。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邪恶的犹太教徒。在《威尼斯商人》中,有很多角色吸引观众,但人们记住的还是那个坏犹太人,但他在人们的眼中又不仅是一个坏人。这里面包含着莎士比亚对历

史的深切反思以及对现实恐怖的警觉和隐喻性批判。在《威尼斯商人》中,莎士比亚采取了与马洛不同的写法和视角。结局依靠的是法律技巧,仁爱的呼唤最后让位于强硬的刑罚,价值观的宣扬淹没在得意洋洋、幸灾乐祸的喧嚣中。为此,格林布拉特认为莎士比亚大量借用了马洛的作品,但创造了与马洛的艺术迥然不同的人物和情绪。他希望人们在取笑夏洛克时能够反思或在取乐时深感不安。剧中夏洛克的邪恶性情没有改善,而剧本对他内心的刻画使观众在了无牵挂地开怀大笑之时,不得不关心这个人的命运。的确,莎士比亚的一些做法是和马洛完全不同的,他善于想象一个被折磨得近乎崩溃的人的内心会想些什么。

那么,莎士比亚写出的永远存在争议的《哈姆莱特》又是受到了哪本书的影响?格林布拉特认为,莎士比亚也许看过之前上演的《哈姆莱特》戏剧,然后依靠记忆对旧作重新加工,并且他也应详细读过贝尔弗雷(Belleforest)用法语写的关于哈姆莱特的故事。通过三个版本的对比,格林布拉特认为莎士比亚使出了他惯用的手法,通过挖掘已有的素材,即构造完好的情节、常见的人物类型、可预期的刺激效果,并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超凡的想象力,从而创造出了《哈姆莱特》。在该剧中,他借哈姆莱特之口发出了终极拷问:“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而莎士比亚的处境又何尝不是这样呢?生存的压力、社会的恐怖、信仰的矛盾、家庭的不幸等,使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身上倾注了太多的自我和对社会的观察。

通过上面的文本互文解释,莎士比亚的个性和人格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怀揣理想、虚心学习,对历史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对现实又保持一种审视的态度;他有一种竞争意识,他要超越别人、超越现实,并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去创造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新世界。这也很好地解释了雨果所说的,莎士比亚是“上帝故意不加管束的天才之一”,认为他的光辉将“照耀人类千秋万代,与人类共存亡”。<sup>[6] 147</sup> 强烈的动机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必备因素,而深刻的人文关怀又使一个人的作品成为人们取之不尽的精神食粮。有人把20世纪称为“传记革命”的时代,这场“革命”的核心就是“解释”进入了传记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传记是一个人的生平及其性格发展的历史和对这一历史的解释”<sup>[2] 3</sup>,而在解释一个人的性格和生平成就时,对传主生命中原动力的挖掘就显得特别重要。格林布拉特细心地从

文本中收集证据,并对证据进行研究和鉴别,特别通过对莎士比亚作品与同时代作家作品的比照,从而发现了莎士比亚与众不同的秘密。

## 二、作品与历史事件、传主生平的互文解释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是各种文化交锋的时代,同时它也充满了动乱、不安和阴谋。莎士比亚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战争、政坛骤变、谋反、暗杀等就很好地反映了这些,特别是他的历史剧记述的虽不是当时英国的历史,可这些作品的某些情节反映的却是英国当时的社会状况。1599年,深受女王宠信的埃塞克斯(Essex)将军远征爱尔兰镇压叛乱。他们的军队遭到了爱尔兰的顽强抵抗,遭遇惨败。1600年,埃塞克斯因擅自返回伦敦,女王把他软禁在家中,不复恩宠,这使骄傲任性的埃塞克斯十分恼火。他召集自己的朋友策划了一场武装暴动,但很快就溃败了。1601年2月25日,埃塞克斯被当局以谋反罪判处死刑。莎士比亚对埃塞克斯的叛乱是有预感的,1599年,其在《亨利五世》中就影射了此事。《亨利五世》将近末尾时,描绘了国王从阿金库特战场胜利地回到伦敦的场面,剧中写道:“伦敦居民都倾巢而出了!……走出来迎接得胜的凯撒归来。再打一个不那么显赫,但也同样充满深情的比喻,正像如今我们仁慈女王手下的那位将军,要是他在不久的将来从爱尔兰归来,在他的剑尖上挑着被镇压下去的‘叛乱’,那时候会有多少人离开安静的城市出来欢迎他!”(五幕开场)“那位将军”指的就是埃塞克斯。在此,莎士比亚表明了对于埃塞克斯的支持,并意图向伦敦的市民灌输一个成功起义的概念以及为密谋者鼓舞士气的想法。1601年2月,莎士比亚的剧团演出了具有政治色彩的《哈姆莱特》,这是一部描写背叛和阴谋的戏剧。其中有一段武装叛乱的场景表演,叛乱分子冲进皇宫禁地,威胁着国王的生命,但雷欧提斯的这次叛乱最终没有成功。剧中(四幕五场)借克劳狄斯的巧妙虚伪之词戏谑地影射了当时官方评价伊丽莎白女王的话:“一个国王是有神灵呵护的,他的威焰可以吓退叛逆。”《哈姆莱特》、《亨利五世》和“暴动事件”的有趣关联,在莎士比亚的其他剧本中也有所反映。

《理查三世》、《裘力斯·凯撒》、《理查二世》都是关于政坛变化、阴谋和暗杀的故事。传记创作中,历史事件是必不可少的元素,格林布拉特的分析使我们看到了莎士比亚对政治和历史的态度以及对人性回归的期盼。

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

1575年(一说为1576年),莎士比亚的父亲曾向纹章局申请代表绅士资格的盾形纹章,但该申请被搁置了起来。莎士比亚作为一个剧作家兼演员,出于对身份地位的深切感受以及复原身份的渴求,于1596年重新申请并获成功。格林布拉特认为复原之梦萦绕着莎士比亚的一生,在《错误的喜剧》《第十二夜》和《暴风雨》中都表现了这样的主题。针对这种现象,格林布拉特对莎士比亚的内心作了剖析:“我不应当只受雇工的待遇,不应该像流浪汉那样受鞭撻;我不是仅在舞台上装扮绅士的人;我是一个真正的绅士,……我凭自己的努力和想象使家庭恢复到情况恶化之前的模样;我矢志维护了母亲的显赫姓氏,恢复了父亲的荣誉;我对失去的世袭权提出权利要求;并已创造了这一世袭权。”<sup>[5] 86</sup>这背后隐含着莎士比亚向权势的挑战和对平等的渴求。格林布拉特对莎士比亚生平事实及其作品的互文剖析,使我们有理由认为,探究莎士比亚生平要从一些事件中探求其心灵的轨迹。这也是20世纪以来以斯特雷奇为代表的新传记作家遵循的一种创作原则。20世纪的传记革新主要表现为将新精神分析用于传记写作。新精神分析主要是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对传主生平事实进行解释,而格林布拉特用互文分析的方法达到了同样的目的。

莎士比亚的个人生平资料极缺,而关于他离开学校之后来到伦敦期间的生平资料更是一片空白。有的学者把这段称之为“失落的年份”<sup>[7] 135</sup>,于是各种说法纷沓而至。格林布拉特对这些传说不置可否,而是结合作品推理,认为莎士比亚是受巡回剧团演员表演的吸引,从而决定离家去追寻他的梦想。格林布拉特认为,年少的莎士比亚也许像《皆大欢喜》里的奥兰多那样,把诗句刻在树上。他应该还曾在其父亲的手套作坊里干活,因为手套、兽皮、皮革在他的剧本里频繁出现,这似乎说明他对该行业十分熟悉。格林布拉特的对照分析,虽不能完全证明莎士比亚就在皮革作坊里干过活,但足以说明他是一个处处留心的人,生活中的细节都在其作品里得以体现。莎士比亚把这些细节用作隐语的素材,在构思作品时很好地驾驭了这些素材。莎士比亚对生活的细致观察还包括生活中不尽人意的地方,譬如他的家庭生活恐怕就不令他十分满意。且不说婚姻,仅他与父亲约翰·莎士比亚关系的传闻就很多。通过对剧本中一些情节的分析,格林布拉特推理出莎士比亚的父亲喜欢酗酒,这是家庭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同时也使莎士比亚在生活上变得比较窘迫,

也使他在生活境遇得以改观后,同样保持节俭的生活习惯。莎士比亚可能并不十全十美,他和当时的斯特拉福镇人一样很普通。不过一些当代的学者,特别是凯瑟琳·邓肯·琼斯(Katherine Duncan Jones)在她2001年出版的《生活中不文雅的莎士比亚》中,把莎士比亚描绘成一个彻底不受人喜欢的人物:残酷、好竞争和耍阴谋。但是,格林布拉特倾向于把他看作一个深谋远虑、精明的剧作家,认为莎士比亚对其父亲酗酒感受颇深,并借哈姆莱特之口表达了对酗酒的厌恶。《第十二夜》二幕三场里醉醺醺的、无法无天的托比·培尔契爵士奚落清教徒马伏里奥:“你以为因为你讲道德别人就不许喝酒取乐啦?”在《亨利四世》第二部第四幕第二场中,约翰·福斯塔夫爵士发表了自己的狂想,列举了生产于安达卢西亚赫雷斯的白葡萄酒“雪利酒”的优点,对其引发巧智和勇气的能力进行了戏仿性的科学分析。格林布拉特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在格林布拉特的学术思想里,他十分关注权力以及人们对权力的恐惧。莎士比亚的父亲酗酒也许是想从中获得某种勇气:他信仰天主教,但不敢表明,并且还须为国教控制的镇政府工作,因为在当时信仰天主教是十分危险的。因此,他只有借酒消愁,结果却导致了家庭的衰败。

通过互文解释,格林布拉特赋予逸闻以新的意义,其目的不在于证实传说的真实性,他关注的是传主的性格。莎士比亚对生活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他是拿着放大镜观察生活的,他对生活中的真善美有自己的判断。一些学者对格林布拉特的这种传记方法提出了批评,指出了新历史主义与严肃传记之间的紧张关系。马里兰州罗伊奥洛学院的英语教授罗伯特·迈奥勒(Robert Miola)认为,新历史主义使莎士比亚研究者“更多地关注文化和艺术成就之间的关系,甚至把这一理论应用于传记写作”,并指出,“像传记这样艰辛的工作应该用旧历史主义的写法,即关注在案的手迹原稿、地方档案、事实证据,新历史主义的不足是失去了对真实事件的耐心,常常依靠一些不可靠的奇闻轶事,这是一种对事实根据的一种误导”。<sup>[8]</sup>他表达了对传记创作发展方向的担忧,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传记也是文学,它有时需要想象力的发挥,不然传记就失去了其审美的特质。当然,写传记也不能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把文学的虚构性置于崇高地位,“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sup>[9]29</sup>。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论断,其结果只能是把纪实文本逐出文学伊甸园。因此,传记作为一种纪实性很强的文类,事实固

然重要,而合理的想象也是非常必要的。

### 三、作品与历史背景、人们的精神风貌及风俗习惯的互文解释

“16世纪和17世纪是个宗教大论战的年代”<sup>[10]184</sup>,通观格林布拉特的《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是如何成为莎士比亚的》可以得出,他是把莎士比亚放在一个大的宗教背景下叙述的,其重要的生平事件几乎都与宗教有关系。西方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在中世纪的欧洲,宗教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和言行,从中世纪走出来的文艺复兴也不可能没有宗教的色彩,并且此时的宗教斗争变得更加激烈了。虽然基督教宣传仁慈与博爱,但统治者只是把它作为一种统治的工具加以利用而已。战争和谋杀、断头和沉默,这一切多少都和宗教有关。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带来牢狱之灾。

16世纪是个令人不安的世纪,斯特拉福镇的人们经历了突变、不安和观念的混乱,他们目睹了英格兰的宗教转变:从16世纪20年代亨利八世猛烈攻击路德的宗教改革,形成以国王为领袖的天主教信仰之后,依次转变为小心翼翼、犹犹豫豫的新教信仰;更激进的新教信仰;复兴的、激进的罗马天主教信仰;最终又变为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新教信仰。每次宗教转变都伴随着阴谋和迫害。大多数人为了生存的需要养成了一种习惯,即对双方的强烈主张都保持怀疑性的超然态度,因为所有这些不同形式的宗教虽然都宣扬所谓的“爱”,却是靠酷刑和迫害来实施的。即便如此,也有些人相信不朽灵魂的命运取决于恰当的崇拜形式,官方的信仰和仪式的改变对他们来说极为痛苦。地方社团解体了、友情破裂了,人们的内心备受折磨。如此情境下,莎士比亚又会如何呢?格林布拉特认为,他应该是一个双重信仰的人。格林布拉特在《炼狱中的哈姆莱特》中指出,哈姆莱特似乎是一个既信仰天主教又信仰新教的人,但他又对这两者持强烈的怀疑态度,因此焦虑、恐惧、混乱和哀怜充斥着全剧。这种内心的恐惧和痛苦应该与莎士比亚的内心感触是一致的。他和哈姆莱特一样受现实和信仰的折磨,他的伟大之处是把恐惧的能量汇聚到他的作品里,心灵的震撼和伟大的人文精神在这里结合得天衣无缝,莎士比亚的人格、心理和思想也很好地在该剧中得到体现。格林布拉特没有把莎士比亚描绘成一个有坚定信仰的圣人,也没有把他描绘成一个被恐怖完全控制的人,而是认为他找到了一种生存的策略,并把这种心灵的感受倾注到他的剧作中。他是一个平凡而又充

满想象力的人,他把生活的碎片写进作品,这些碎片就是历史的最好注解。在记述莎士比亚的信仰时,格林布拉特运用的方法是结合作品分析和想象力,当他完成此书接受别人采访时,他也承认了这一点。对此,有的评论家提出批评,因为他触及当代莎士比亚生平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即莎士比亚是一个天主教徒吗?格林布拉特似乎在传记中回避了这个问题,正如他说的那样:“在这个充斥着宗教氛围的国度里人们必须时时警惕,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组成的,就好比是在20世纪50年代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一样。这种较量决定了人们的生活。”<sup>[8]</sup>这应该是对莎士比亚信仰的最好注解,也是他在作传记时力图向事实靠近所做的努力。因为他相信,历史和作品是可以互相注解的,而历史中的人必然在作品中有所折射。细读作品,人们不仅可以发现历史事实,也可以发现心理事实。尽管人们对他传记写作的方法非议多多,但他并没有偏离传记的方向,他的写作对传记也许具有革新的意义。

受福柯(Foucault)的影响,格林布拉特还从性的视角对莎士比亚的内心世界进行了分析。福柯认为在伦理学上“欲望应该得到强调,在实践上得到接受,因为你不得不解放自己”<sup>[11] 359</sup>。格林布拉特应该读过福柯的《性史》,他把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用在传记写作中,虽然不尽全面,但还是让我们看到了莎士比亚隐秘的一面。这一点在以前传记家写的莎士比亚传记里几乎没有涉及。针对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格林布拉特说:“在这本书的其他地方我都大胆地推测,但是对这些诗我却备加谨慎,因为我觉得在这些诗里莎士比亚为我们设置了太多的陷阱。”<sup>[8]</sup>格林布拉特把十四行诗称为“半透明的幕帷”(a translucent curtain),认为从性的角度阅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更具吸引力。通过对十四行诗中炙热的情感语言以及南安普顿伯爵的实际情况的互文解释,格林布拉特认为这些诗应是献给南安普顿的,并且暗示出了莎士比亚对南安普顿的爱恋之情,而这在现实中又难以实现。通过格林布拉特的解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莎士比亚在情感上处于欲望与自我道德约束的冲突之中,他充分利用了自己的身体资源,将身体的感受在理想的诗歌中得以实现。格林布拉特用性和欲望来揭示莎士比亚性格中的隐秘之处,该分析建立在坚实的互文推理上,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他的推理有时也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显得牵强附会,他挑选有利于自己阐释的诗行,而对有些诗行却不够重视。他虽然没有直接说明莎士比

亚是个同性恋者,但是他的分析引导读者相信这是事实,或者至少认为莎士比亚是有同性恋倾向的。对于热爱莎士比亚的人,在现有的伦理价值观的范畴内似乎难以接受。但格林布拉特的可贵之处是,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完整的莎士比亚,尽管他的探索有不尽人意的地方。面对“半透明的幕帷”,我们只能看到模糊。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是这样,莎士比亚本人更是这样。格林布拉特在传记写作,特别是在解释传主个体与自我冲突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童年记忆对个人一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莎士比亚的童年生活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话题。格林布拉特认为,斯特拉福镇是一个充满浓郁风情的地方,生于斯长于斯的莎士比亚也一定对此有深切的感受。他应该经常和朋友、家人参加当地的霍克节、复活节、五朔节活动。五朔节是一个非常热闹的节日,人们长期以来以五朔节来纪念罗宾汉,并伴有各种喧闹和一些淫秽的仪式。莎士比亚戏剧的语言和一些剧中所呈现的狂欢景象应该与此有关。在对莎士比亚的童年生活进行了一番想象后,格林布拉特认为,这些民间风俗对莎士比亚的想象力影响深远,在形成他的戏剧观方面,甚至比那些流动剧团带到边远省份的道德剧起的作用还要大。也许这里面包含有对秩序和等级的破坏,这些情景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特别是像《仲夏夜之梦》、《皆大欢喜》等喜剧中都得到很好的体现。格林布拉特的分析向我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即贴近生活是莎士比亚戏剧魅力的重要源泉。莎士比亚把他童年的记忆当成可利用的资源带到伦敦并随心所欲地加以运用,他实实在在地利用他的人生的一切经历,将之作为取之不竭的文学隐喻之源。现实的土壤永远是艺术家的生命之源,前苏联学者阿尼克斯特在他的《莎士比亚传》里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创造性想象是一切大艺术家的巨大力量,它却不能离开现实而存在。现实永远——过去、现在和将来——是艺术创作得以发展的环境。”<sup>[12] 258</sup>

对传主童年记忆的挖掘是现代传记家经常运用的写作方法之一。20世纪中叶前后的传记家对此倍加重视,不过他们主要从心理分析的视角解释传主童年记忆及其对传主一生的影响。例如,法国传记家莫洛亚(Maurois)在他的作品《三仲马》里,指出大仲马童年时代受到歧视,这些在他的潜意识中始终是个伤痛,他的复杂、多面的性格以及他的创作都与此有关。其他传记家也运用童年记忆的精神分析

法叙述传主的生平,像艾德尔(Edel)的《詹姆斯传》、艾尔曼(Ellmann)的《乔伊斯传》、霍尔洛伊德(Holroyd)的《斯特雷奇评传》等都采取了这样的方法。格林布拉特也运用童年记忆,不过他是采取互文的历史解释方法,这种方法有利于我们了解莎士比亚时代那种与伦敦生活和宫廷生活不一样的乡村普通人的生活。

格林布拉特把莎士比亚的生活环境放在一个大的宗教背景下,史料、文化的政治批评和作品解读紧密结合,解释了莎士比亚的心灵发展轨迹和创作的生活源泉。正如他在这本书中所说:“探究莎士比亚的全部推动力都来自于一种强烈的信念,即他的戏剧、诗歌不仅来源于其他戏剧和诗歌,也来源于亲身经历,来源于他的身体和灵魂。”<sup>[5][13]</sup>他用互文性的解释策略达到了其解释的目的,是对莎士比亚魅力之所在的最好注解。他继承传统传记的创作手法,整部传记基本以时间的先后顺序为轴线,但又不时地打破时空顺序。以莎士比亚的精神特质和心灵轨迹为核心,以文本细读的方法,结合历史解释、心理解释和福柯的政治哲学解释,通过它们之间的“能量”转化,描绘出了一个充满人文关怀和独立个性的莎士比亚。格林布拉特在叙述莎士比亚的生平时,又采用了后现代主义的方法,他没有隐藏在故事的幕后,而是把自己作为叙述者,强调叙述者的存在和观点,并经常用“让我们想象”、“让我们推测”、“你可以认为”、“也许”等字样引导读者主体性介入;他在与“死者”对话时,也邀请读者一起对话,在对话的过程中共同塑造莎士比亚。他在继承传统传记和新传记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政治文化的批判,采取对于传记写作具有探索意义的互文性解释的方法。正是互文性的解释使莎士比亚的一生得以呈现出来,这种

解释的策略,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传记的历史推理动力模式”,即传记是一个人生平和性格的发展史。当生平资料不足时,如何描述一个人的一生,互文性解释会使历史事实得到印证和补充并以丰富的想象去解释事实,解释的过程也就是创造的过程。而创造是符合逻辑的推理,互文性解释就像一台发动机,推动着读者的想象力去勾画传主的一生。

#### [参考文献]

- [1] 杨正润. 传记文学史纲[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4.
- [2] 杨正润. “解释”与现代传记理念[M]// 杨国政. 传记文学研究.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3] Lytton Strachey. A New History of Rome[J]. Spectator, 2 January, 1909.
- [4] David Bevington, Editor. The Complete Works of Shakespeare[M].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04.
- [5] Stephen Greenblatt. Will in the World: How Shakespeare Became Shakespeare[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4.
- [6] 维克多·雨果. 威廉·莎士比亚[M]. 卞忠, 译.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1.
- [7] Marchette Chute. Shakespeare: The “Lost years” [M]. New York: E. P. Dutton and Company Inc. Publishers, 1985.
- [8] Richard Byrne. The Writer's Tale[J].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Vol. 51, Issue 6, October, 2004.
- [9] 亚里士多德. 诗学[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 [10]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人类的历史[M]. 徐船山, 译.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2007.
- [11] Paul Rainbow, ed. The Foucault Reader[M]. New York: Partheon, 1984.
- [12] 阿尼克斯特. 莎士比亚传[M]. 安国梁, 译. 郑州: 海燕出版社, 2001.

## Tactics of Intertextual Explanation in Writing Biography

——Case Studies of Greenblatt's Will in the World: How Shakespeare Became Shakespeare

XU Qin- cha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61, China)

**Abstract:** Shakespeare's works are full of charm, but the facts of his life are very few. The question of how Shakespeare became Shakespeare attracts many biographers and scholars to explore all along. Taking histor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surroundings as the background, Greenblatt's Will in the World: How Shakespeare Became Shakespeare narrates and explains Shakespeare's life and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intertextual explanation of works and works, works and historical facts and anecdotes, works an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people's spirit and the custom and folkways. This kind of intertextual explanation achieves its goal and explores and enriches the writing methods of biography.

**Key words:** Shakespeare; intertextual explanation; biography; humanist feelings